

“左翼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国际化语境与美国文学翻译

黎 箐

内容摘要:左翼十年,无论是文论的建构抑或创作的革新,都与翻译密不可分。文学翻译为左翼十年营造了难能可贵的国际化语境,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其中,美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尤为独特,在满足革命作家的文学构想,强化文学的政治色彩之余;又溢出了左翼文人的文学期待,将自由、求真的思想与纪实、创新的手法引入了中国文坛。美国文学的翻译已成为左翼十年中国翻译文学多维空间里的重要一维。

关键词:左翼十年 文学翻译 国际化语境 美国文学

DOI:10.16692/j.cnki.wxjys.2019.06.093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十年”,从时间上来界定是指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段。这期间以左联成立为核心事件,以左翼作家为主力军,中国文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左翼十年的文学功绩,既有文学理论的探索,也有文学创作的实践,还有文学翻译的积累。而无论是文论的建构抑或创作的革新,都与翻译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文学翻译为左翼十年营造了难能可贵的国际化语境,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尽管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变迁的原因,俄苏文学与日本文学的翻译更为直接地塑造着中国左翼文学的现代型态;但是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学也趁着思想开放的契机,裹挟着多种多样的文学观念传播到国内,对左翼文坛造成了冲击。其中,美国文学翻译的影响最为独特,在满足革命作家的文学构想,强化文学的政治色彩之余;又溢出了左翼文人的文学期待,将自由、求真的思想与纪实、创新的手法引入了中国文坛。毫无疑问,美国文学的翻译已成为左翼十年中国翻译文学多维空间里的重要一维。

一.文学翻译营造的国际化语境

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

传统,文学的社会功用尤受重视。自国内文学翻译伊始,发乎功利之心以追求社会变革、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为目的文学翻译观就备受认可。晚清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峰,数量惊人,文类繁多,包括了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寓言、童话等体裁。依《晚清戏曲小说目》记载,仅小说一门,“翻译小说达600多部,约占当时出版小说总数的三分之二”。^[1]这样的翻译趋势绝非偶然,实是近代中国社会强国保种的文化诉求致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启蒙的传统仍在延续,态势却更加激进。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学思潮不断被引介至国内,令人应接不暇、耳目一新。文学翻译此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翻译家的选材对象大都锁定在了俄苏文学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上。前者翻译的动机源于当时中国半殖半封的民族屈辱,以求唤起国人自尊自强的信念;后者则有赖世人渴求自由独立的共通心理,希冀鼓舞国人踔厉奋发的斗志。一时间,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家反映文化落后、社会黑暗、封建压迫的经典名篇都被译介了进来。同时,波兰、保加利亚、芬兰、智利、捷克、巴西、匈牙利、土耳其、阿根廷、埃及等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也陆续有所翻译,甚至结集出版。

尽管众多的翻译作品主题不同、风格各异,但能够顺利进入到中国的文化语境广为传播的根本原因均在于其对思想启蒙和旧制革新的促进作用。这一翻译动机显然秉承了始自晚清文学翻译的初衷。

及至左翼十年,郭沫若、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左联作家也曾大力提倡文学翻译。仅鲁迅本人就参编了两个翻译刊物,一是《奔流》,一是《译文》。《奔流》对苏俄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极为重视,先后刊发了《伊孛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增刊》、《莱夫·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增刊》和《译文专号》。比《奔流》更专业化的《译文》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刊发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从1934年9月到1937年6月的全28期内容涉及了纪德、左拉、普希金、高尔基、罗曼罗兰、杜勃洛柳甫夫、迭更司等众多作家的文学创作。虽然《译文》从诞生到停刊再到复刊几经波折,但《译文》复刊词中鲁迅还是隐曲地表示希望文学翻译能在“一点乐趣”之余有“一点益处”。^[2]这“益处”正如他在《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中所说:“因为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家,一时恐怕是

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3][95]}这种窃火以济民志的做法在鲁迅看来同样是医治旧中国顽疾的良方。

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使得众多左翼作家纷纷投身文学翻译的行列,夏衍、蒋光慈、钱杏邨、杨骚、柔石、韩侍桁、洪灵菲、楼适夷、穆木天、戴平万等都翻译过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虽然他们的翻译活动屡遭国民党的查禁与压制,但左翼作家们依旧坚韧地履行着自己的红色使命。即便是反革命政变后,中苏外交关系被迫断绝,左翼作家仍借日本文学翻译为桥梁,冲破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的重重阻碍。日本文学也因此吸引了中国翻译界的眼光。左翼十年约有130余部^[4]日本文学作品被翻译引入,包括了藏原惟人、厨川白村、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秋天雨雀、小川未明、田村俊子、有岛武郎、平林泰子、藤森成吉、横光利一、前田河广一郎、德永直、森鸥外、林房雄、志贺直哉、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山田清三、武者小路实笃、郎夏目漱石等作家的著作。众多的翻译文学作品共同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国际化语境,成为其现代性生长的话语空间。

二.俄日翻译影响下的中国左翼文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迅速升级至敌我存亡的政治斗争。国民党的几次武装围剿遭到中国共产党的顽强抵抗。左翼文坛作为中国国内革命的一翼,开辟了重要的文化战场,配合了武装战场的反围剿行动。正像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幕词中总结的那样:中国的革命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两支军队,虽然一个是拿枪的军队,一个是文化的军

队,但都同样面临着残酷的浴血战争。尤其是1930年代,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了中国的左翼文坛。上海作为左翼文学的重镇,是国民党反动机关管控最为严厉的地方。左联等文学社团也曾两次遭到了查禁。许多作家不仅被列入黑名单,还遭到特务组织的暗杀,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鲁迅因多次被通缉忿然感慨:“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5][96]}“文禁如毛,缇骑遍地”。^{[5][97]}压抑的言论气氛、肃杀的文化战场使得左翼作家越发体会到革命的艰辛与斗争的不易。如何在险恶丛生的政治时局中找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是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要的问题。

当此国难危机之时,文学翻译再一次地彰显了它的伟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到他的影响。人们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实现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6][78]}于是,中国文坛迎来了俄苏文学翻译的红色出版浪潮。此时不单俄苏文学作品被大规模译介,由于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及其对苏联文艺的推崇,日本文学翻译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实际上,左翼十年俄苏文学与日本文学进驻中国文坛的强劲势头还不止于数量上的优势,更深远的影响是文学观念的植入,促使左翼文学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关于俄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有过详尽的评述。他说:“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然而从文学里

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7]反抗专制者的暴政、解救被压迫者于水火之中,创造无产阶级的新社会,是俄苏文学给予国人的文学命题。所有的文学活动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一革命性的主题而展开。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针对革命与文学关系的分歧将1928年中国的革命文学论争推向了高潮,并蔓延至整个左翼文坛。这一过程中,俄苏文学和日本文学的译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文学论争者们直接从俄苏、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代表人物那里吸取理论观点,彼此辩诘。

关于引介外国文学和观念,鲁迅认为:“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的多了。更好是介绍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8]但是对单一理论观念的过分倚赖却有害于中国文学的生长。为了纠正革命青年对个别文艺观念偏狭的理解,鲁迅还特意编辑了《壁下译丛》,倡导多元的文艺理论。诚如鲁迅所言,革命文学论争者对政治立场、阶级意识的推崇几乎成了左翼文坛压倒一切的共同倾向。它严重地撕裂了革命文学阵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①即便是左联成立以后,这种伤痕依旧潜伏在新的文学团体中难以弥合。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干预下,1930年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各方暂时放下各自的偏见站在了同一个战壕内,但内部的分歧并未消除。

三.美国文学翻译的改写与折射

从俄苏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翻译可知文学翻译对译语国家文学的深刻影响。文学翻译绝不只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刻板摹仿,而是介于两套文学系统间的改写。“改写能引进新的文学观念、体裁和新表现手法;另一方面,

改写也可能压制革新,歪曲和吞噬新元素。”^[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翻译积极地介入了文学史的书写,翻译文本有了独立的品格。它不再是原语文本的副本,而成为译语国家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折射出译语国家文学的整个系统环境。左翼十年文学翻译为中国现代文学营造了国际化语境,美国文学翻译也是这一语境中颇具实力的一维,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容小觑。这期间美国文学有两次相对集中的翻译时段。一次是左翼文坛对厄普顿·辛克莱的译介,一次是《现代》杂志推出的“美国文学专号”。但这两次翻译的动机却不尽相同。前者倾向于政治的需要,而后者则出于文学的诉求。差异的存在源于文学系统控制机制包含的两大要素:“一个是来自系统的环境的赞助,它们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来自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它们关注的是诗学”。^[10]两种要素的此消彼长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学有意识的改写,也透露出美国文学作为折射文本预示的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点。

1930年代共产国际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在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美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左翼思潮的兴起也使得美国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学十分繁荣。文学队伍不断壮大,既有党员出身的左翼作家,也有支持社会主义的左转文人。文学刊物层出不穷,《解放者》、《新群众》、《党派评论》、《铁砧》、《左翼前线》、《新力量》、《反叛诗人》等刊物均力主无产阶级文学。文学创作佳篇迭出,《屠场》、《没钱的犹太人》、《烟草路》、《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穿靴子的人》、《北纬四十二度》、《挣大钱》、《老左》、《胜负未决的战斗》、《鼠与人》等都是代表性作品。这些左翼文学作品为中国的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1928年底,郭沫若率先翻译了辛克莱小说《石炭王》,“辛克莱

热”继而席卷中国文坛。仅郭沫若一人就翻译了辛克莱的多部著作,^[2]足见其重视的程度。然而正像不少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次对辛克莱作品大规模的翻译是“一哄而上”的行为,缺乏艺术上的审美选择,不过是对文学明星的时髦追捧。这股时尚风潮的引领者正是冯乃超、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的成员。

尽管当初创造社少壮派回国时带了日本福本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阶级性、革命性、斗争性的论述都颇有底气,但就文学的本质为何这一问题,却无从下手。这必将成为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构架的一块短板。急于冲破理论困境的冯乃超和李初梨最终找到了救星辛克莱,借助其文论著作《拜金艺术》的部分观点为文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1928年2月15日的《文化批判》上刊载了冯乃超翻译的《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该文内容就是辛克莱原著中的第二章“艺术家为何人之所有”。随后,李初梨在同一期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截取了辛克莱的部分观点,宣称“文学是艺术的一部门,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11]如此创造社才圆满了其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幻化,为革命文学论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由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12]话虽不假,但这之中美国文学的翻译亦功不可没。

事实上,冯乃超对《拜金艺术》的翻译并不完全,创造社对辛克莱文论观念的理解也不过一孔之见。1928年2月16日《北新》第8期上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其中译引了《拜金艺术》的第四十四章(《革命的喇叭手》)和四十五章(《哈佛态度》)。此后,从1928年4月到1929年8月,郁达夫又陆续译出了《拜

金艺术》的19个章节。^[3]至此,辛克莱的文艺观念才初见概貌,并引发了不同的文学思考。1928年5月的《北新》上登载了一篇署名冰禅的文章《革命文学问题——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严正指出辛克莱的见解都被冯乃超、李初梨的译介有意识地改写了,最后只剩下“文学即宣传”的金科玉律。阶级性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学至高无上的审美标准。

“本土系统在自身进化的某一阶段对某位作家的需要,也决定了国外作家为本土系统所接受的程度。”^[13]创造社对辛克莱的翻译与改写印证了中国左翼文坛的极左倾向。随着革命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弊端不断暴露,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表示不满,甚至采取行动。1934年10月施蛰存、杜衡^[4]主编的《现代》杂志第五卷第6期刊发了“美国文学专号”。引入新的翻译维度,以打破文坛思想的禁锢,革新创作固有的套路,是这次美国文学译介的基本立场。专号对美国文学的赞许溢于言表:“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美国文学,即使在过去为英国的传统所束缚的时期内,它也绽露了新的东西的萌芽。”^[14]为了展现美国文学多元化的艺术特征,专号特别分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多个栏目翻译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从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现实主义作家,到辛克莱、刘易士等左翼作家,再到海明威、福克纳等现代作家,专号都进行了介绍,并配有小传和评论性文章。编者的苦心孤诣可见一斑,与当时文坛的左倾洪流呈针锋相对之势。尽管专号的编后记曾郑重声明:“我们编这个专号目的完全是在介绍,而不是有所提倡。”^[15]这里仍须指出的是,编者出于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建设需求,将美国文学翻译作为了塑形中国现代文学的样板。如此文学姿态依旧是中国近

现代翻译文学的惯性使然。

无论如何,“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对美国文学特质的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第一次充分地肯定了美国文学的自由精神,扭转了以往文学批评与史论将美国文学视为末流的不公局面。而美国文学翻译的影响也早已超越了创造社等革命作家对其文学的期待。就在整个中国文坛狂热地高扬辛克莱的“宣传”旗帜时,郭沫若却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学习辛克莱的写实态度上,并号召青年作家“去访问那时的当事人”、“考核当时的文献”,^[12]务必抱以忠于史实的精神。作为美国“揭发黑幕运动”的主要作家,辛克莱关注社会问题的焦点始终在工商业领域。他的《屠场》创作于对芝加哥肉类加工行业严肃、深入的调研之中。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他与工人们同吃同住,最终以其科学、严谨的纪实文风铸就了《屠场》的不朽。这种坚毅的创作精神通过其作品的译介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中国的作家们。例如茅盾就认为中国文坛的普罗文学“最大的病根则在那些题材的来源多半非亲身体验而由想象”。^[16]^[32]为了创作《子夜》,茅盾不吝花费大量的时间走访经商办厂的亲戚朋友,到证券交易所、火柴厂、丝厂实地探访,使得他的作品以典型的形象和跌宕的情节复现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世相百态,具有史诗般的气势。茅盾也被誉为“中国的辛克莱”。^[17]这样的影响恐怕是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始料未及的。美国文学对自由、创新的追求,使其拥有他国无法比拟的丰富性。而左翼文坛的复杂性正与美国文学的多元性相契合。美国文学求真、务实的风格对国人也深有启发,令左翼十年的中国文学有了往不同方向生长的可能。

综上所述,左翼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环境极其复杂。不仅有政治与文学的抵牾、左翼与右翼的冲突,还有传统与新声的

争斗、国内与国际的对话。还原左翼十年中国翻译文学的国际化语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特质,追索出文学现代性的源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关于起源一接触关系充分知识,那么我们就几乎不可能在各国文学间过程中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环境。”^[18]须知“现代是主体突然意识到它自己站在一个自为的境地,去呼应周遭现象的问题。……现代性总其名曰,是种概括20世纪在我们的历史生存情境里面,我们所遭受的诸样的刺激与我们回应的方式。”^[19]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记载,从1917年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共有13500余种文学书籍出版发行,其中翻译文学数目有3894种,约占此时期全部文学书籍的29%。^[43]左翼十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弹指一瞬。不同历史时段里美国文学翻译或其他国家的文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断探讨。

参考文献

- [1]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鲁迅.复刊词[J].译文,1936(1).
- [3]鲁迅.集外集拾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4]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
- [5]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7]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J].中国论,1933(2).
- [8]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J].未名,1929(8).
- [9]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Andre 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9).
- [10]耿强.重返经典: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理论批评[J].中国比较文学,2017(1).
- [11]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J].文化批判,1928(2).
- [12]麦克斯.桌子的跳舞[J].创造月刊,1928(11).
- [1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14]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J].现代,1934(6).

[15]编后记[J].现代,1934(6).

[16]茅盾.茅盾全集(第1卷)[M].合肥:黄山书社,2014.

[17]朱明.读《子夜》[J].出版消息,1933(9).

[18]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9]吕周聚.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王德威教授访谈[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2)

注释

①鲁迅在1927年以前就曾向许广平表示:“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参见《两地书·六九》)而后据鲁迅日记1927年的两段记载。11月9日:“郑伯奇、蒋光慈、段可倩来。”11月19日:“下午郑、段二君来。”这是创造社代表两次访问鲁迅,商议共同恢复《创造周报》,提倡革命文学的佐证。

②郭沫若先后翻译的辛克莱作品包括:《石炭王》上海乐群书店1928年11月初版、《屠场》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8月初版、《煤油》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6月初版、《血路》上海南强书局1932年2月初版。

③这19章包括:第一章《阿崴,阿崴的儿子》、第二章《艺术家是谁之所有?》、第三章《艺术与个人性》、第四章《劳动者和他的报酬》、第五章《沐神恩的人们》、第六章《虚饰的幼稚时代》、第七章《阿崴是夫人出现》、第八章《马的买卖》、第九章《阶级的谎言》、第十章《阿崴夫人说要“及时”舞乐》、第十一章《甘萨与犹太》、第十二章《英雄崇拜的时代》、第十三章《百分之百的雅典人》、第十四章《反动的滑稽家》、第十五章《基督教的革命》、第十六章《支配阶级和被治阶级》、第十七章《烟雅的天堂》、第十八章《邪恶摘发者的地狱》、第十九章《信神的毒药谋害者之群》;分别刊发在《北新》第2卷第10—18期、第24期,第3卷第1—4期、第6、7、10、13、14期。

④原名戴克崇,祖籍浙江,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自居反文艺和“左翼”文艺间“第三种人”,“苏汶”、“杜衡”都是其笔名。

(作者介绍:黎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